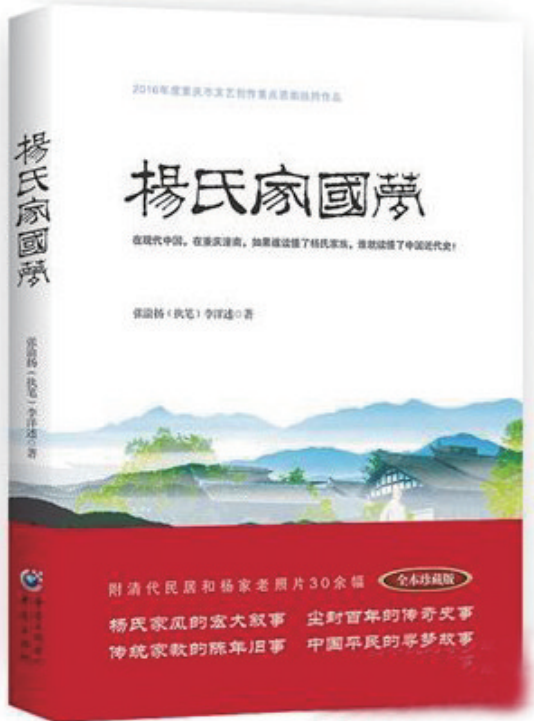


家

国情的典范

□何建明



我相信许多人与我一样,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其实我们知之甚少;我也相信许多人与我一样,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历史,其实我们知之更少。

读完张渝扬创作的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杨氏家国情梦》,不由得令我对杨尚昆、杨白冰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我们的老首长(本人15年的军旅生涯正是在杨尚昆、杨白冰担任军委首长时)产生前所未有的敬意!其实,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应当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为中华民族的翻身与崛起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张渝扬的作品并不是专门写杨尚昆和杨白冰的,而是“杨家兄弟”的父亲与兄长等杨氏家族人物的历史传奇与革命故事。读完这部作品,我的第一感受是:在中共历史上,能像杨尚昆这样的父亲和兄长为了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家族不多,或说独此一家!过去我也听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人物杨闇公的大名,尤其熟悉他所培养出来的革命烈士、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这样的奇才。

杨闇公同志牺牲于1927年4月6日,那时他就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和军委书记。杨闇公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最早将武装斗争付诸实践并为之牺牲的革命家。1926年,正当“北伐战争”风起云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开始显露其反革命野心之时,以杨闇公为第一书记和军委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举行“泸顺起义”。这是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之前的一次我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为此,杨闇公同志派刘伯承、吴玉章和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朱德、秘密从北京回四川的陈毅到四川军阀部队做策反工作……“泸顺起义”烽火遍布四川大地、威震整个中国,给当时蒋介石和反动军阀们以沉重的一拳,更重要的是它为不久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提供了经验和输送了一批杰出的军事指挥员,除因“泸顺起义”而被敌人残害的杨闇公外,朱德、刘伯承、陈毅、吴玉章等都成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杨闇公一手策划制订和领导的时达167天的“泸顺起义”,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播撒革命种子和扩大政治与军事影响力的目标,为共和国输送了三位元帅,这足以说明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杨闇公是杨尚昆的四哥,是杨尚昆、杨白冰等多位“杨家革命兄弟姐妹”的引路人。杨闇公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的。在监狱里他大义凛然,无数次拒绝蒋介石等军阀的诱力,牺牲时极为惨烈:敌人不敢公开枪杀,借黑夜在一个悬崖边,先打断他的双腿,再割其舌头,后又挖掉双眼,又砍断双手,再朝头胸腹连开三枪……看到此处,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国人有谁不对杨家肃然起敬?

历史的延伸给予人们舒展心事的平台,那些顽石、暗礁在漫长的时空中淡化成风和影子,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勾连不起宏大帷幕,他们漂浮在难以理解、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中,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心事浩茫连广宇。一个家庭之内人与人心事的相遇,需要场域和契机。《大风》这部小说选取了各怀心事的一家人,每一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成长史和精神漂泊史,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叙述了漫长历史进程中,家族四代人逃离、谎言、压抑、畸变、疏离、寻找、离散的心灵轨迹。他们怀着失望、怨愤、怒火和茫然,内心的黑暗无法抛洒到阳光之下,心灵暗礁都急需重见天日。

小说以家族第一代太爷张长工的诈死信息为开端,分散在外的儿孙们倦鸟归巢,私生的重孙子梅子杰则遭遇飞来横祸,被一个花盆砸在脑袋上,他的魂魄飞升,潜入这个家族,他看到了他们的内心和想法,听到了他们的暗夜低语,他们的倾诉之洪。这是一部全部由个人私语组成的小说,每一个人的满腹心事和长篇大论,都是从自己出发,整理自己的个人故事和内心情绪,有明确的倾诉对象,比如爷爷张广深是对张文亮说的,孙子张文亮的话是对重孙张子豪说的,孟梅、陈芬是分别对自己的儿子说的等等。这些话语暗流汹涌奔突,不可阻挡,冲垮了所有的现实藩篱和障碍。这是借助梅子杰的灵魂获得的内心解放和交流的桥梁,他们平时都是语言不通,互不相见,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政,画心未界。就像一家人在老家的饭桌上对这个时代和人心的批判一样:天象有异,世道太坏,而他们正是这个世道中人,每一个人都是现象的观察者,又是表现者,他们是时代的囚兽,连接不起来,又彼此触摸不到。《大风》创造了一种能量,让孤独者相遇。

《大风》的作者李凤群说:“写作尤其是向历史更深处回望的写作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遗

杨氏一家可谓忠烈满门,浩气盖天!这得感激哺育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等革命领袖人物的杨淮清先生——他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做人导师。

杨淮清先生可能是中共领袖们的父亲中最了不起的一位。首先是杨淮清一生养育了19位子女,虽然其中有4位夭折了,但其余15位则个个长大成人,并各有建树,尤其令我们敬佩的是杨淮清先生一家有12个子女参加了革命,且中间有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等中共领袖级人物,此乃中共历史上独一无二。

过去属四川而今隶属重庆的“双江”这个小镇,便是杨家所在地。双江镇是历史文化名镇,镇上的“杨家大院”支撑着这个名镇的骨架,美誉着这个小镇的肌肤。双江镇的“杨家”太了不得,他们的祖上能追溯到唐王杨氏裔族。后分支入川,各奔前程,到杨淮清这一代则已经在双江小镇有一二百年历史了。杨淮清的祖父、也就是杨尚昆的曾祖父杨世绥建立了双江镇“杨氏家族”至高无上的地位。杨淮清是杨世绥后代的“么房”,也就是辈分最小的一门根系,其他门户可以分得5000亩地,他杨淮清仅能分得1000亩薄地,显然是家族中不被看重的“小弟弟”。然而杨淮清以其“清白做人”、“凡事后退一步”的治家与处世,使他渐入人生佳境,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子女以培育远大志向和救国本领而著称,才有了后来12位子女前赴后继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史话。杨尚昆在家里排行“老五”,在他小时候,父亲给他起了个“诚五”的小名。杨淮清对五儿杨尚昆说:“诚五,你要记住,我杨家的处事为人是讲诚实、守本分。我给你取名‘诚五’,就是希望你做个诚实守信的人。”杨尚昆一生受父亲“诚实守信”的思想影响极大,遵义会议时,杨尚昆就是“秘书长”一级的人物,解放后他一直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办主任”,后几十年又同邓小平等革命家一起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成为卓越的中共领袖人物。

《杨氏家国情梦》一书,无疑是一部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它所记录的是以杨淮清为代表的杨氏一家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积极向上、富有仁爱和理想的家国情怀,值得国人好好学习和领悟,并以此为榜样。我相信“什么样的土壤种出什么种子”、“什么样的雨露阳光哺育出什么样的花朵”这朴实而正确的道理。杨家出了那么多革命者、出了那么多各行各业精英,与杨淮清这个“家长”的开明、进步与追求分不开。

读完此书,我更加敬重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等“杨家将”,尤其更加爱戴甚至羡慕像杨淮清这样的“家长”。中国多一些杨淮清这样的家长,也许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中华民族要复兴,家长的作用必不可少。杨淮清这样的家长是我们每个时代都特别需要的。

李凤群《大风》

大风过后,草木有声

□项 静

弃、隔绝与尘封做着对抗,小说超过了小说家想展示的容量和潜力,小说像一根暗黑的丝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回访一人人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寻常日子和历史动荡,它的容量和野心是一部当代家族心灵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人迁徙离散的小历史。家族第一代太爷张长工在江湖中的紧要关头,丢车保帅,把自己从历史的狂潮中心连根拔起,带领老婆孩子一路狂奔一路舍弃,最后连名字和记忆都自我篡改了,他谎话连篇,蒙混过关,沉入自己记忆和家国历史的陌生之地,重新安全地活一遍。他把生存作为第一要义,为了子孙后代今后守卫生命,他活成了另一个人,他不断地发明和实施自己的生存哲学,对儿子、孙子、重孙子。他是家族故事的缔造者,也是旧梦的记忆者,他随时随地编造谎言,忍受一切痛苦和折磨,等待着翻身和重新开始,世道轮回。

张广深是一个被父亲的生存哲学压抑到畸形的第二代,他成为一个众人眼中的傻子和挖洞的人,并且深深迷恋这种外壳和安全感。在政治形势好转后,他性格逆转,变成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他脾气暴躁、力大如牛、满世界寻找机会却又一无所有,他终生生活在对老子的不满和怨愤中。孙子张文亮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体会到了深切的寂寥和无助,是爷爷张长工激发了他的自尊和斗志,并且得到了心灵的抚慰,他对家族的旧日荣光有着宗教般的热情,在故乡寻觅不得后,又把

《独门》与我

□李西岳

严格意义上说,《独门》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百草山》,写英雄的成长历史及心路历程;第二部《血地》写冀中抗战斗争生活,以上两部作品都是地道的主旋律,作为军旅作家,有使命感。而《独门》却让我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彻底颠覆,没有任何使命意识,完全是心灵的独白与解剖,纯粹意义上的精神回望、人生反思与道德批判。

《独门》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三个家族三代人命运的起承转合,沧桑裂变。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独门李家的孩子,形象丑陋却聪明过人的“我”立誓要出人头地,最远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成人成才成事,去改变独门小户在村里受气的命运。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我”从小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叛逆行为,在有意无意间做了一件又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仅使李家与王家的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性质转变,也使李氏家族内部裂痕显露,危机四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说前前后后追溯了上百年的历史,但主要叙事时空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冀中平原农村,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亢奋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血脉贲张的洪荒岁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由一个“怪胎”所演绎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婚嫁嫁娶、男耕女织、悲欢离合、人情世故、酒色财气、柴米油盐、鸡鸣狗盗、个人荣辱、家族兴衰、世道人心等等,就格外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荒诞色彩和悲情色彩。

小说中的“我”并非生活中的我,但直言不讳,确实有我的影子。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爷爷奶奶、爹娘、叔婶儿,三个小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周围三乡五里没有这样的大家庭,别人都羡慕我们家和和睦睦。其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庭更不例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促使我早熟,稍懂些事

关于故乡,不提也罢,因为它早已随时光之水漂逝,除了一个不知所指的词语和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址,一切构成故乡的要素都被篡改、清洗得了无踪迹——斗转星移,物易人非,荡漾于心的往昔记忆与情感却如一缕游魂,飘来飘去,终究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落脚之地。

那日,读薄景昕的散文集《春秋得闲》,突然就有了一些归乡的感觉。他写故乡的小河,写野菜、老井、碾道、大粪堆、开花的桃李和广阔的草原,也写太奶、爷爷、父母、亲人以及那些和野菜野草一样顽强、质朴又暖心、“养人”的乡亲。文字温润、舒缓如潺潺流淌的小溪,在记忆的森林里蜿蜒、伸展,不喧嚣、不炫耀,却在波澜不兴的叙事中,显现出润泽的力量和精神的光芒。不知不觉间,一颗思乡的心,已随着他的引导渐行渐远,至“丛林”深处,仿佛此身已经成功地穿越了“时间虫洞”,又回到了如梦如幻的从前。

景昕的散文很有带入感,大约也就是术语中的“移情”效果,特别是读他那些叙述往事的文字,明知道字字句句都是别人的记忆,却摆脱不了字字句句对自己情感的牵扯。当他写自己挎着筐子去挖野菜,“胳膊都勒红了”,好像疼痛的并不是他,而是自己;当他写抓鱼时,鱼儿排着队往他的“须笕”里钻,我的心也和他一样兴奋得通通直跳;当他感慨于父亲的沉默、韧忍和黯然离世,我仿佛再一次体验了自己父亲由生到死的无奈和凄凉。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后来,他又在《科尔沁草原和我》那一节里写到“……望见窗外蓝天上的白云,心里‘咯噔’一下,我确信这就是我家乡的白云,科尔沁草原上的白云……”我的心,也“咯噔”一下,因为我也曾在一片草地上望着眼前的白云,想起

体之后,一进门,说什么、做什么,都要看看每个大人的脸色,生怕说错过做错惹出麻烦。大家庭一旦起了事儿,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不好收场。我从小就感觉到,这个大家庭是敏感,甚至是脆弱的,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错进了我的记忆,融入了我的历史,垄断了我的精神世界。所以,我早早立下志愿要为这个大家庭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写一部小说。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开始动手的时候,我想模仿《红楼梦》,那里边写了四大家族几百号人的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些大言不惭,那“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氛围我无力制造,还有那广场式的结构我也无力驾驭,后来,我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像在黑暗中摸索,忽然间被人打开了一扇窗,我的思路瞬间开阔、清晰起来。我何不写一部带有自传体、忏悔式、心灵独白式的小说呢?我所积累的原始素材完全具备这样的可能。普鲁斯特有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若干年后,我们回过头去或许会笑自己当初的青涩、莽撞,但是自己所做的决定绝对不会后悔的,因为‘我’就是‘我’。”的确,《独门》中的“我”青涩、莽撞、天真、玩味、叛逆,年纪不大,却做了很多让人不消停的事。他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家庭不安生的导火索。然而,他执著地奋斗,拼死地挣扎,不甘平庸地活着,他在一路成长一路折腾中获得了人生意义上的某些成功,这个人物有着复杂性、多面性和怪异性,但我不能去模仿普鲁斯特,像《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整个作品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的故事,一来我不是意识流或魔幻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家,说确切点儿,我压根儿不是那品种。二来中国读者向来爱看故事,我必须把故事讲好,离了这一点,我就没丝毫的本事了。另外,我还对卢梭的一段话

薄景昕《春秋得闲》

故乡是朵洁白的云

□任林举

一别经年的故乡。但是,我以前在文章里却从来没有写过。没写过,是因为我还没想明白自己以及自己和故乡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直到看了景昕的文字,我才发现,那朵白云正是与自己失散多年的故乡。故乡并不是彻底消失了,而是像我自己的情感一样飘在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场“风”,就把它吹到了我的眼前或心头。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或者说散文的力量。景昕把他的散文集递给我时,脸上挂着谦虚的微笑,声称自己不太会写散文,而阅读之后,我却要很真诚地说,我非常感谢并不以写散文为“主业”的景昕,写了这样一本纯正而又独特韵味的散文。感谢他这些如清风一般的文字,为我提供了一个情感的出口和一份关于故乡的怀想;更感谢他对散文的尊重和敬爱。

散文作为一种在结构和操作上并无严格框范的文体,看似门槛极低,谁都可以伸手一试。从中学生的作文,到某位政要的讲话,其间的日记、演讲、言论、说明、小品文等 everything 无不法归类的文字似乎都可以划入散文的阵营,但真正要把散文写好,却又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绘画界有种说法——画鬼易,画人难。之所以画人难,是因为画人是不可以胡乱编造任意涂抹的,你要对你的描绘对象负责任。至于散文,更是这样,不但要“画”人,而且一定要“画”

后感兴趣:“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我就写成卑鄙龌龊的;当时我是忠厚善良、道德高尚的,我就写成忠厚善良道德高尚的。”可以说,这两位大作家对我写《独门》影响很大,我大致确定了方向,也确定了作品的类型及表述方式,那就是用纯属于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大概用了15年的时间。这期间,经常被各种使命文学打断,写作停停、断断续续,拿不起又放不下,完成初稿之后,又用了两年的时间修改,其中包括把电子版文字发给朋友,然后听朋友谈意见,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记录下来,回来慢慢整理、消化、吸收。我如此重视这部小说,是因为这个题材在我内心储存时间太长,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不吐不快,又怕吐了更不快,所谓的更不快,就是怕吐不好,吐出毛病,留下诸多遗憾和顽症。我认为,无论再伟大的作家,无论如何高产,其代表作或者重要的作品,也就一两部。陈忠实把《白鹿原》视为“垫棺做枕”之作,就说明他认为《白鹿原》是个真宝,再就是断定自己以后很难写出超越它的作品了,陈忠实是明智的。我觉得《独门》未必能成为我的“垫棺做枕”之作,但就我个人阅历积累和创作能力而言,也不会有多么大的超越了,所以我才这样看重它,用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去打磨它,让读者看到我辛辛苦苦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卢梭曾这样表述过自己:“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我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实际上,我的表现比卢梭有过之而不及无不及。我平时是个很庸懒的人,每天一睁眼就先看手机,睡觉前也是溜完手机才闭眼,与朋友打扑克、网上玩游戏,丝毫不吝惜时间,不爱惜身体,过后便后悔不迭,但再遇机会,仍乐此不疲。但更多时候我是清醒的、明智的。我是一个作家,靠写作吃饭,靠作品安身立命,尤其现在,使命文学不多了,应该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必须强有力地证明自己还活着及其活着的价值。

自己。这就要求写作者拼出自己的情感、情怀和深度了,没有深厚的内力必难持久。不但质量上难以持久,连数量上都难以持久。写散文,不管你写谁,写什么,一写就露出了写作者的身形,藏是藏不住的。就算你满心想把散文写好,如果“底版”不行,怕是使尽浑身解数也很难涂抹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美好形象。

薄景昕的散文,虽然称不上天籁之声,细品起来则别有一番感人肺腑的韵味。往往,就在轻松、散淡的叙事之后,他会突然来一段出入人意的“和弦”或一个奇妙超拔的“颤音”,那种金属质感的音色,直入人心,自然会引发出阅读者或长或短的共鸣。他在《东秋》里写:“……又见到东秋,她纯然已成为一个中年妇女,左手抱一个一岁大的男孩,右手牵一个6岁大的女孩。见到我时,说了一句话,老叔,头便低下了。”他又在《碾道》的结尾处写:“……童年,就是这样的情景——在碾道里,驴昏天黑地地走着,我时不时地跟在驴后面扫粮食,二姐在不停地拍打打着面箩,单调而有节奏……”

在仅仅10万字的集子里,这样的笔触比比皆是。于是,我从“二姐”拍打面箩的节奏里,感受到了景昕童年的节奏;我也从这种节奏里回想起我自己童年的节奏;我又因此而“看见”了这世界上很多人生活和生命的节奏。

的《一句顶一万句》有相合之处,都是中国人心灵(词源意义上的)“百年孤独”。刘震云让一个个孤独的人辗转在乡村小镇,甚至是广阔的国土去寻找可以说话(说得着)的人,他们坐在一起尽情地“喷空”(说话聊天),不管他们说什么,仅仅是那种为了寻找可以对话的人而付出的心力,因找不到那个可以说话的人而获得的惊喜,就成为一种活着的意义。《大风》是一家人之间的对话,不管能否说得着,大家都只管放开了闸门尽情宣泄,这是孤独的根源,他们对于这些话和情感能否获得回应,能否被听见并没有把握,张文亮跟儿子讲话的时候,首先要提醒他放下手机,专心听听家史,而太爷爷的话只有梅子杰能听懂,况且在所有的说法和讲述中,没有一个发言者主动提及和回应那个对着他(她)的发言。单向度的诉说和渺茫的回应,暗示着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次机缘,这多么心事和内心暴戾将会湮没不闻,天聋地哑。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大风大浪中孤独的小舟,没有生息相往,没有援手可施,他们在一代一代的发展中,仿佛又回到了第一代太爷奔突在暗夜原野上的情状,装聋作哑,低头赶路。《大风》是一首哀伤的歌曲,它唱着命运、无常、轮回,它躲开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的解释,不管不顾,尽情地哀唱了一回,就像为一场即将到来的葬礼预演。大风过后,草木有声,声音是记忆、痕迹和活着的证据,大风起又灭,世道轮回、时间流转,不改草木葳蕤,不改打破沉默和喑哑的心力。

